

杜斯基的生活

小林秀雄 著
李永熾 譯

水牛文庫158

水牛出版社

水牛文庫

157

杜斯基的生活

——即「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生活」

小林秀雄 著
李永熾 譯

水牛出版社

THE LIFE OF FYODOR M.
DOSTOEVSKY

BY KOBAYASHI HIDEO

TRANSLATED BY LEE YENG-CHYH

COPYRIGHT © 1970

BUFFALO BOOK CO., LTD

TAIWAN

R.O.C.

杜斯基的生活

水牛文庫 157

著者	小林秀雄
譯者	李永熾
發行人	彭誠晃
出版者	水牛出版社
發行所	水牛出版社
	臺北市連雲街26巷21弄2號
	郵政劃撥賬戶第13932號
印刷所	中臺印刷廠
	臺中市公園路37號
每冊定價	新臺幣 18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59 年 9 月 30 日

有版權

登記證：內臺業字第1245號

人類靈魂的挖掘者

——杜思妥也夫斯基

方 瑜

當浪漫主義挾其狂飈席捲西歐的同時，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仍在沙皇、秘密警察與農奴的噩夢中沉沉熟睡。在這片古老沉睡的大地上，首先呼吸到西風的少數先覺者，如伯林斯基、赫爾岑與屠格涅夫等都狂飲西潮，醺醺如醉，赫氏與屠格涅夫後半生更長居異國，他們雖然未必完全忘情於俄國的土地與人民，但在生活習慣與思想方式上却已不能自禁地接受了歐洲文化深重的影響。這種情勢，細心的讀者往往可以從屠格涅夫的作品中清楚地體會出來，處身於俄羅斯古老傳統與西方浪漫主義新鮮、強勁衝力的夾縫中，屠氏以冷靜、睿智的「旁觀」態度，創出了俄羅斯知識份子虛無的典型，但如將巴札洛夫與「卡拉馬助夫兄弟」中的伊凡相比，立刻可以見出兩者性格之迥異。伊凡在虛無面具之下，不斷因內心的熱情、欲念、懷疑、自責而受苦，表面冷漠的

否定與內心激情的執着，終於迫使伊凡患上嚴重的腦熱而喪失神智。這與巴札洛夫始終冷然的「旁觀」態度，相差不可以道里計。而這種「旁觀」與「介入」的不同也就是十九世紀當代俄國兩大文豪——屠格涅夫與杜思妥也夫斯基（即杜斯基——譯者）性格上的根本差異。

杜思妥也夫斯基一生貧病坎坷、波瀾起伏，極富傳奇性，他任情縱性、遇事猶疑的矛盾性格，在作品中充分流露，「文如其人」這話，對屠格涅夫與杜氏是同樣適合的。他熱愛俄羅斯廣袤的土地，更熱愛生活在這土地上卑微如蟻的百姓。從杜思妥也夫斯基筆底傾洩而下的熱淚與同情，遠非「貴族感」自覺極濃的知識份子如屠格涅夫等所能夢見，縱觀杜氏的作品，他全神關注的主題始終是「人」，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人。他們的歡喜、憤怒、欲望、懷疑、企盼、焦慮、痛苦、悲哀、信仰、罪惡……超越了狹隘的時空囿限，成為全人類亙古共存的實感，杜氏以他的天才、銳筆，再加上一生種種不凡的際遇，參透了人性最深暗的奧秘。粗心的讀者，匆匆讀過他的作品，也許會忽略了書中叙及的時空背景，但決不可能忘懷從他筆下躍現的一個個鮮明、突出、大特寫似的「個人」。爲了躲債，杜思妥也夫斯基也曾數度浪跡歐羅巴，可是，他不曾探訪任何一處名勝、古蹟，除了賭場之外，只喜歡痴立街頭細細觀望川流而過的人羣。這分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執着，使杜氏豐裕的天才獲得繼續不斷的新鮮養料，終於能開花、結果，在由他賦予生命的無數人物身上，杜思妥也夫斯基往往以不着痕跡的幾筆，將其人的外貌輕輕帶過，而以

全付心力集中在長篇猶疑的獨白、霸道的雄辯，把他們靈魂最深處的隱秘揭示出來，在作者閃亮、鋒銳的鋤刀之下，「人性」的礦脈，終於無可遁形，不能不鉅細靡遺地暴露在讀者眼前。將書中人物的靈魂一個個予以孤立解剖，再重新拼聚融合，呈現出一整幅複雜悸動的畫面，這是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專長。

對作家——杜思妥也夫斯基而言，死刑場上的被赦使他得以體驗死亡前瞬間的感受；西伯利亞的流放，更讓他從社會公認的惡人身上發現了「人性的黃金」，這些稀貴的經驗，加上他敏銳的觀察力、突發的熱情、異乎常人的好奇與困擾終身的自疑，造成杜思妥也夫斯基思想上的龐雜、深邃、無條理，由此也間接剝奪了他的行動力。對於處理實際事務，幾乎完全無能為力，拖延、苟安、逃避是他慣用的手法，以債養債的結果，杜思妥也夫斯基不能不在狡猾的債權人虎視眈眈之下，痛苦地趕寫一生大部分的傑作。他的天才從一次次的「考驗」裏愈加獲得明證，一旦執筆，那種對「創造」本身的熱狂，常使他下筆不能自休。凡是讀過杜氏作品的人，對他那種「飛躍式」的獨特語法，屏息顫慄、不能自己的熱情，滔滔不絕的雄辯和震撼人心的力一定印象良深。我們很難相信，就在這孱弱軀體之中，清癯面容之下，竟蘊含有如許迫人的火焰、光亮與熱力，竟噴發出如許豐繁的思想、人物與世界！

在他短短六十年的生命中，「卡拉馬助夫兄弟」無疑地佔有極為特殊的地位。從一八七八年

起——正是尼采發表「人性的、太人性的」同時——杜思妥也夫斯基以最後三年的光陰，全力撰寫這部傑作，直到一八八一年垂死之際，仍然只完成了原來計劃的一半，但就以現今刊行的這半部而論，杜思妥也夫斯基也已攀登了他自己一生創作的高峰。

在自序中，他說：「這是一部偉大的罪人生活的記錄。」全書以一件弑父的凶殺案爲經，三位兄弟截然不同的性格、經歷、人生觀爲緯，交織成這一部撼人心弦的鉅著。有沒有神？什麼是罪？如何才是真正的信仰？爲什麼愛的力量強過一切？這些問題在書中以各種方式被提出，經過不同角度巧妙地辯論、解析，終於結束在阿萊莎（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位）明朗、微笑、向未知前途展望的目光中。

從米卡、伊凡與阿萊莎三兄弟的性格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與作者本身都有某種程度的類似：老大米卡，一方面擁有向善的意力，但同時也有卡拉馬助夫家族情欲的血，常常受不住突發熱情的誘惑與驅使，任情揮霍、沉迷。這股永遠在體內燃燒不能扼止的激情，以及事後痛切的慚悔，對於曾經執迷輪盤、不能自拔的「賭徒」——杜思妥也夫斯基而言，決不陌生。

老二伊凡——俄羅斯當代知識青年虛無的典型，由於不斷目睹現實世界的不公、殘酷與黑暗，不能不對上帝的存在發生懷疑：「不是我不接受上帝，而是我不能接受他所創造的世界」，在這樣的邏輯推演之下，伊凡的結論只有將上帝根本否定，由此，作者提出一句著名的虛無主義

宣言：「如果沒有上帝，則一切皆可被允許」。但是，雖然「結論」如此，伊凡的心仍是火熱而躍動的，充滿對蔚藍天空、油綠樹木、溫暖泥土及一切真、善、美的摯愛，在他自己的史詩——「大宗教裁判官」中，伊凡反對上帝的一個極强有力的理由是：上帝讓「這世界的泥土中浸滿了無辜孩童的淚水」。伊凡太年輕，他註定不能成為徹頭徹尾的虛無主義者，理論與內心的矛盾，日夜啃噬着他善感的心，終於，「間接弑父」的重荷，使他完全崩潰。這種表面行動力與內在信念的尖銳衝突，與生俱來、至死方休的懷疑、自苦，同樣也是杜思妥也夫斯基性格的特徵。

老三阿萊莎——虔誠、善良與愛的化身，他是作者原來計劃中的主角，但在這半部未完成的「序曲」中，我們只能看到二十歲以前的他，阿萊莎愛他精神的導師——長老曹西瑪，愛他兩個不幸的兄長，甚至也愛那「罪孽」的化身——老卡拉馬助夫，三兄弟的父親（如果只要給予生命，就算是「父親」的話）。但他最愛的仍是那羣可愛可憐的孩子，他稱他們為「我的小鴿，可愛的青鳥」，聰明、解事的阿萊莎，有一顆純真、潔白孩童般的心，他對「善」與「愛」執定不移的信念，正是垂老的杜思妥也夫斯基「最後的一根葦草」。阿萊莎與書中那羣孩子的相處、交談，是作者描述得極為動人的部分，在全書驚濤駭浪、雷聲隱隱的迫人氣勢之下，這些溫馨、哀愁的畫面，尤其扣人心弦，常使讀過的人禁不住熱淚盈眶。在父親被殺、長老去世、兩位兄長一個瘋狂，一個被迫逃亡之後，阿萊莎終於決心脫下袈裟，走向人間，走向塵土，他向摯愛的孩子們一一

告別，小孩們圍住他，凝視和期待的眼神釘在他身上，傾聽他的別語：「……一個好的回憶，特別是兒童時代，從父母家庭裏取來的回憶，是人生最高尚、最強烈、最健康、最有益的東西，……甚至假若只有一個好的回憶留在我們心裏，也許在將來某個時候它能成為拯救我們的一個手段……小孩們！親愛的小孩們，你們不要懼怕生命，在做了一點好事，一點真實的事的時候，生命是如何的好……」這樣的結束，這種對愛與生命的肯定，不能不讓我們連想到晚年的托爾斯泰。

除了主角之外，全書出現的各色人物不下數十，不論着墨的多寡，杜思妥也夫斯基都能使他們栩栩如生，他平時對「人」的觀察，對「人性」的深入瞭解與發掘，在這本書中充分表現，作者以垂暮之年、爐火純青的圓熟技巧、火焰將滅時最後的輝耀，寫下這部不朽的傑作，「卡拉馬助夫兄弟」是杜思妥也夫斯基懷疑終身之後的「肯定」，他複雜思想的析影，對人性終極的瞭解與同情，也是這位痛苦的天才最後的「天鵝之歌」！

如果說文學史上的確有過不能彌補的缺憾，那麼，不能一睹「阿萊莎正傳」應屬其一。

譯序

這本書是日人小林秀雄『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生活』的全譯本。杜思妥也夫斯基(Fyodor M. Dostoevsky)是十九世紀和托爾斯泰齊名的俄國大作家。其一生的顛沛苦難很少作家能及得上。但這苦難給他的却是心靈的歷鍊與人性心理的分析，使他從這苦難中創出了「卡拉馬助夫兄弟」這一偉大的作品。

十九世紀的俄國，對知識份子來說，是一苦難的時代：人權遭遇到無比的蹂躪，言論、出版自由被限制到極小限度，甚至連私信也要受到檢查官的控制，其他的更不用說了。但在這苦難的時代裡，知識份子並沒因此而氣沮意喪，仍然用寒帶民族所特具的忍耐力，和政治惡勢力周旋到底，擊發了俄國十九世紀所特有的文學燦爛火花及人道精神。杜思妥也夫斯基與托爾斯泰的光彩

遂照徹現代世界的各個角落。

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一生正和十九世紀的俄國知識份子之苦難相終始。在他苦難與奮鬥的一生中，有許多事蹟是值得現代人去體會挖深的。日人小林秀雄用同樣遭遇的心情，反近代主義的筆緻，刻劃了這位偉人的點點面面。小林在三十年前，也和杜氏一樣，遭受到政治的壓迫與威脅，但仍與川端康成等在嚴厲的言論控制之下，編集「文學界」雜誌，「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生活」即連載於此。他用他全部的熱情與時代遭遇的共感傾力撰寫此書，意圖讓此書達到世界第一流水準。據日本文藝批評家江藤淳言，此書確已臻此，堪與E. H. Carr的「杜思妥也夫斯基傳」東西輝映。小林撰寫此書時，已將杜氏的遭遇和自己認同，因而書中自然孕育有小林的淚痕與心靈傷痕。小林雖然故意把杜氏對象化，企圖用客觀的筆觸來描寫他，獲得了相當的成就，但只要了解十九世紀俄國知識份子與二次大戰前日本知識份子的處境，就可知道，小林的故事掩飾是無用的，書中處處流露着他對杜氏的同情、共鳴，以及他對時代的投射。歷史總是無法真正客觀的。

讀者閱讀此書時，也許會發現本書有點零亂，這是小林文章特有的風格。他著述時，最討厭條理分明，對他來說現代的簡潔條理，最缺乏內在的張力，很難給人心靈的自然共鳴。因此，他寫作時，只顧對象的精神，而不顧文理脈絡的條理。我們讀他的作品，先有了這個心理準備，才

會領略到他作品中的奧秘，並發現其無條理中的條理，而引起心靈上的共鳴張力。

譯者翻譯此書是有點勉強的。第一：小林的意境，很難把握得住，其作品精神更是如此。第二：小林的文理和譯者所學的歷史文章完全不同，譯來總覺有點格格不入。第三：譯者對俄國史及十九世紀俄國文壇缺乏認識，翻譯時，總覺力不從心。但譯者不願這部傑作只藏在書架上，才把它譯出來，讓讀者便於接觸偉大的心靈。

因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譯名太過冗長，譯者才擅自將之簡化為「杜斯基」，祈望讀者原諒是幸。譯者本意僅在使讀者易讀易記而已。

翻譯此書期間，承蒙方瑜、方山兩姐妹抄繕，謹此致謝。在我校閱此書時，正是我忙着準備婚事的時候。在我和方瑜的五年交往中，她不僅給我許多精神上的支助，而且還傾全力詳閱過我出版的各類書籍。她在我精神沮喪時勸慰我，她在我為生活而奔波時，同情我、鼓勵我。每當我看到她那令我心醉的微笑，我的精神就來了。現在，我們倆正將步上結婚的禮堂，我的心已充滿了幸福和快樂。這本書就算作是我送給她作為我們倆結婚的禮物吧。

李永熾

序於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九日結婚的前夕。

原序（歷史論）

「從病者的光學（見解）觀看健全的概念，復從生命的豐盈與自信，俯視頹廢本能的靜寂作用——這是最漫長的練習、我特有的經驗，如果我在某些事務上能夠成為大家，那也就在這一點上。」

——尼采「看呵！這人」

1

有這樣的一句話：「最後，只有一些土塊，撒在頭上，於是一切都永遠過去。」我們會覺得

這是一句很平凡的話。據說，這句話是來自巴斯卡的「沉思錄」。平凡的人說平凡的話，等於白費。但平凡的話，一旦出自巴斯卡，那就一定凝聚了許多非凡的功力。我們對其非凡功力，已驚異不已，所以對他所說的平凡真理，就不會更覺驚訝，因為我們已牢牢記住，驚訝也是徒然。不管巴斯卡用了什麼樣的功力，一切仍然永遠過去，而他的功力完全沒有關係，這是很自然的，無足驚異。

語言雖不曖昧，但歷史問題乃產之於這類人所被安插的曖昧事態裡，而無法超脫出來。

2

一切都永遠過去。誰都不會對此語發生懷疑，但可裝出懷疑的樣子。雖然我們希望沒有過去，因為我們活着。但，事實上並不能如此。歷史是從這個「希望」中產出，同時，我們還企求事先捕捉過去事務，但此一過分企求，顯然無能順利完全。

譬如：我們保存巴斯卡的話，顯然是以歷史保存之，而非以真理保存。表面看來，我們似乎是因其是真理才保存它，其實，這並不是我們希冀保存的結果，而是自然留存的，但「自然」仍會過去。

「自然」經常與人類毫無關係地存在。沒有人，就不會有歷史。歷史與人同始同終，對之，

需加以徹底思考。

有史以來與有史以前，究竟有無本質差異，這質問相當笨拙，如說地球有人，對自然是一偶然事件，那末，自然一定無法區別人類所留下的各類痕跡，就和無法區分冰河留下之痕跡與貝殼留下之痕跡一樣。地球載着人類及其他生物運行，是暫時的。沒有人會注意到，爲了這個暫時性，自然會改變其機制。在這樣的自然世界中，人類有能力與之對應，這能力即爲自然科學的精神，它在純粹的形式裡，不能不儘量確立脫離人味的「自然常數」。這個人類自動將之化爲嚴密尺度的能力，也許是自然強迫我們而來的；也是我們對無際地擴延、無際地持續，而又一望無際的自然，所採取的自我防衛手段。歷史強迫我們什麼？如果沒有我們就沒有歷史的話。

自然，無疑是存在於我們的外部。至少，自然是一個非以之爲對象，來脫離我們之精神即無法思考的東西。但，歷史是存在於我們的外部嗎？沒有史料，我們就不會有歷史。史料的原本樣式，都是物質，它只是自然受到人類傷害的傷。如果只是傷，自然就不能臻至另一命運。自然無需假借人類之手治傷。史料有如岩石遭遇風化一樣，不斷湮滅。如果此一湮滅爲人類所提前，那對自然只是一項無足驚異的幸福。這些原態的史料，如果非以自然而存在，那末，讀歷史就和我們的能力有關係。這能力和發明史料這一詞語的能力完全一樣。此一能力，拒絕將史料當作自然碎片來感受。如果這樣，就會有一個能力來對應將史料視爲自然碎片的另一能力。取得古寺瓦片

的人，往往是双重人，一方面稱量它的輕重，一方面又去幻構人類的形相。

這兩種能力——將人自然化的能力和將自然人性化的能力——經常難以分別地混合在我們的裡頭，但這二種能力，不僅在完全相反的方向內活動，其性質亦無絲毫類似，我們似乎可以把它們各自的性質誇張研究。自然越疏遠我們，越會以最適合我們了解的世界顯現，換言之，我們由於踏上外物檢證的階段，縱然不知真理為何物，至少也可以使揚棄不堪檢證之物的真理世界，和自然對應。支持這世界的不是語言。

反之，將自然人性化的能力，乃根植於所謂生物尋求生物的欲望；在本質上，則是一個曖昧的力量。當然這是非理性的力量，自然本來也不是適應人性化之物，因此，所謂人性化的自然，在純粹的形式上，只是神話，亦即為我們語言所支持的世界。

歷史是神話，為歷史之物質性而不得不多少需受限制的神話。歷史是為歷史此一詞語所支持的世界，但非為歷史此一存在所支持。大凡存在者，我們只可稱之為自然，人也是它的一部分。我們將自然人性化的能力，可說是有關非存在者的能力。所謂史料只是這種能力親自感覺到的自然反抗，只要不覺得反抗，這能力即無所不能。譬如，我們可以想像我們是生於冰河時代，這和想像我們是唐太宗的朋友一樣，覺得快樂。如果願意的話，我們可以遇到開天闢地的事。其實，在這類想像力無能為力的地方，歷史只顯現出它的形骸。

對於由外物之檢證逐漸築起真理世界的能力來說，對自然的屈服才是絕對的條件。換言之，由於對自然的屈服，自然的認識才期望它的純粹性。歷史的認識無論如何都無法取得純粹的形式。觀察歷史的條件，即是創出歷史的條件，在這一類不安定的場所中，我們才會發明歷史這一詞語。生物尋求生物的欲求，由於自然形相越來越明顯，處處都會碰到所謂史料的反抗物。欲求的力量並不單純地屈服於反抗物。對此力量而言，外物的檢證，在創造歷史世界這一方面，不過是消極的條件。因此，不管史料有多豐富，在其綱目裡，我們的想像力仍然處處自由。

我們的日常生命，總會感覺到外物的反抗，歷史亦然。在我們使死者復活的希求，與死者們在自然中留下的足跡之間，經常創造出微妙的均衡。在這均衡所從事的工作裡，常會發現歷史常數（如果用這詞語的話），這只是刹那間的事。對於歷史是什麼，這一簡單的質問，人們不得不用各類史觀予以武裝起來。

3

歷史家常喜歡用這樣的比喻：歷史是反覆的。但發生過一次的事，不會再有第二次，這是我們銘記心中的已知物。因為這樣，我們才會惋惜過去。歷史和人類的大怨恨相似。如果同一事件會再反覆，我們當然很難發明所謂回憶這一類具有深長意義的語詞。不管先後僅僅只有一件事